

教育 部 统 编 《 语 文 》
推 荐 阅 读 从 书

三国演义

上

罗贯中 / 著

经典名著
口碑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分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三国演义

上

罗贯中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演义：全二册 / (明) 罗贯中著. —3 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ISBN 978-7-02-013756-5

I. ①三… II. ①罗…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5485 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崔欣晔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57 千字

开 本 65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 张 60.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0

版 次 195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3 年 12 月北京第 3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756-5

定 价 48.00 元 (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导 读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其成书前，“三国故事”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连儿童都很熟悉。随着市民文艺的发展，宋代的“说话”艺人，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当时称为“说三分”。元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实际上是供说书人使用的本子，虽较简略粗糙，但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资料（还包括《世说新语》及注中的资料），经过巨大的创作劳动，写成了规模宏伟的巨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太康元年（280）三国统一为止，描写了九十馀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互相争夺的关系。在它描写的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曹、刘两个集团是主要对立面，而刘备集团则处于中心地位。曹操与刘备是一组对立的艺术

形象,曹操的奸诈、凶残与刘备的宽厚、仁慈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刘备向庞统所言:“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如果说曹操是大奸大恶的权臣典型,刘备是“仁君”的典型,那么诸葛亮则是“贤相”的典型,智慧的化身。而他的智慧在书中则被描写成神机妙算。所谓神机妙算,剥去其神秘的外衣,无非是诸葛亮在斗争中,能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草船借箭的成功,是因为掌握了长江冬季气候的变化;火烧博望坡,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环境的自然特点;六出祁山使用木牛流马,则是在战争中运用了科技发明的成果;空城计的成功,则是利用了司马懿多疑的心理特征。诸葛亮的形象比起曹操、刘备来,更富有民间传说的色彩。

《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所以曹操的传称为《武帝纪》,而刘备的传称作《先主传》,孙权的传称作《吴主传》。这是因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代人,晋是受魏禅让的,晋继续于魏,所以奉魏为正统。虽然如此,陈寿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如评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评孙权是“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但《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如此奸恶也非面壁虚构,它的材料多来源于裴松之注引诸书及《世说新语》及其注。另外,也应看到,《三国演义》变《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而改为以蜀汉为正统,除了刘备是汉中山靖王之后这一因素以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综而言之,它与民间说书艺人有关,也与宋元两代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有关。“拥刘反曹”倾向是历史形成的,它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这种倾向,在北宋后期已经初步形成。据苏轼《东坡志林》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恶,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在北宋时,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在说三国故事的讲史话本中已

很鲜明。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人心思汉,这又为“三国故事”或“三国戏”的拥刘反曹倾向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并非是罗贯中的独创。这种倾向虽然带有封建正统的色彩,但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应当历史地看。

《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是歌颂“仁君”、“贤相”的,对此又怎么看呢?“仁君”、“贤相”是儒家所标榜和赞扬的,它与“仁政”有密切的关系。残民以逞的夏桀、殷纣,是荒淫无耻的暴君,周文王、周武王是“圣君”、“仁君”,周公是贤相。“仁者爱人”,爱民如子便是民之父母。儒家虽如此提倡,但整个封建时代“仁君”、“贤相”还是为数不多,渴望“仁君”、“贤相”出现,期盼治世的太平,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理想。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他们也希望“仁君”、“贤相”、“清官”治世,使自己过吃饱穿暖的太平日子。相对来说,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要比“暴君”、“奸相”、“贪官”轻得多。但要做“仁君”、“贤相”、“清官”就要勤政不怠,就要对自己多些约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廉洁自律,这是大多数封建统治者所难以做到的。就拿曹操来说,他何尝不希望做一个太平“贤相”呢!在他的乐府诗《对酒》中,他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的蓝图: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如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这与《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云云,何其相似乃尔。但曹操身体力行了吗?没有。他虽然写有《内诫令》,

想为自己订些清规戒律，似乎想严于律己，但到头来还是我行我素。他是个“尚通悦”的人，又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不是罗贯中虚构的，而是见载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原话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罗贯中在这一点上并无歪曲。我们认为，歌颂“仁君”、“贤君”，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反映，也是人民的理想之所寄，不能轻易否定。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另一不同是：《三国演义》有不少艺术虚构，两者不仅基本结构的框架不同，描写手段也不同。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它不能呆板地推演史籍，必然有所增删，有所取舍。小说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单凭史书上提供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想象与虚构。《三国演义》的数百名人物，都可在史书上找到，但也有个别人物（如貂蝉）是不见于史书的，属于虚构的人物。至于小说的情节与人物的行事，虚构的成分就更多了。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这个估算大体不错。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它所描绘的人物画廊中，除以上言及的三个中心人物外，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鲁肃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小说又长于战争描写，像赤壁之战，从战前的准备和运筹策划，写到战争的过程及战后的余波，前后用了八回的文字，紧张的场面时见悠闲的插曲，有详有略，有虚有实，波澜起伏，摇曳生姿，在古典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三国演义》不仅过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广泛流传于海内外，而且在今天和以后还会继续产生较大的影响，《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的关系，与人才学的关系，近年来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专书。日本诸国又从《三国演义》等书中，寻找事业成功的秘诀，兴起了中国古典智慧热。日本的企业家在极其激烈的现代商业战争中，还借鉴或汲取过《三国演义》中的战

略战术。近期，教育部发出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通知，使广大中小学生有更多的课余时间来阅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就是教育部选定的名著之一。阅读《三国演义》，对开发中小学生的智力、提高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启迪他们的创造性是大有裨益的。

在阅读《三国演义》时提请广大同学们注意，《三国演义》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封建性的糟粕。如“玉泉山关公显圣”、“诸葛亮五丈原禳星”、于吉、左慈“兴妖作法”、“定军山诸葛显圣”等，都有封建迷信的描写，是应批判的糟粕。对于《三国演义》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特别是义，在今天对少数青少年还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提倡见义勇为，大义灭亲，却不赞成为着小集团的利益而讲究“哥儿们义气”，这是年轻的朋友们应当注意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前 言

元末明初，横空出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写据地称雄，一写山林草莽，都把英雄的豪气作了深刻而富有社会意味的描写。尽管这两部长篇巨著的气韵风貌和美学意蕴迥不相同，然而却都是共同生根在中国土地上，并吸取了中国文化的深厚滋养而成长起来的两株参天大树。具体到《三国演义》，六百余年来，它不仅作为一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一代地不断阅读，得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共同喜爱，而且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心理的结晶，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它已被公认为世界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它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统一三国止，叙事近一个世纪。

《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关于三国的故事就广为流传了。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作注，就辑录了大量的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在隋朝，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已有

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见杜宝《大业拾遗记》)。唐初在民间流传着“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见刘知几《史通·采撰》)。晚唐诗人李商隐《骄儿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连孩子都在谈论三国人物,这说明三国故事在唐代传播十分普遍,而且有些人物身上还涂上了一些神异的色彩。

三国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时候,也正是“说话”、“杂剧”等通俗文艺逐渐成熟的时期,三国故事很自然地成为民间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说话”的“讲史”类中就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讲说三国故事的专家霍四究。其他如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都纷纷搬演三国戏(参见高承《事物纪原》、吴自牧《梦粱录》等)。三国故事在宋代广泛流传,已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云:“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苏轼《志林》也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恶,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代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三国故事话本,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书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分上下中下三卷,约八万字。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全书已粗具《三国演义》故事的雏形,但故事叙写简率粗糙,可能是说话艺人讲述故事的底本。又有题“至元新刊”、“照元新刊”的《三分事略》(今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共三卷),其实它与《三国志平话》是同一书而在不同时间刊行的两个刻本。当时类似这样的话本可能不止一种。元人王沂《虎牢关》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见《伊滨集》卷五)又《虎牢关》诗

云：“回首《三分书》里事，区区缚虎笑刘郎。”（见《伊滨集》卷七）这里提到的《三分书》的情节不见于《三国志平话》，可能出于另一种话本。

元代杂剧盛行，三国故事又被大量搬上舞台。据今存元人杂剧剧目记载，就有近 50 种是三国戏。《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关目，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几乎都有剧本。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即在这样长期的群众创作的基础上，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感悟，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构思，最后编纂了《三国演义》这部概括和熔铸了较长时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长篇巨著。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有简略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予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贾仲明是元末明初人，他的《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他说至正甲辰（1364）与罗贯中见面，又是忘年交，由此推知罗大约生活在 1330—1400 年之间。据传说，他曾一度参加了反元斗争，和吴王张士诚也有过接触。明朝建立后，罗贯中即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专心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了。罗氏一生写过数十种小说、戏曲，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以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三国演义》描写的重点是封建社会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作者很少表现和政治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情节。在这里，一切可能出现的斗争方式都出现了：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而且所有这些斗

争，都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描写的。比如“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假托闻雷失箸，借此使曹操产生错觉，“遂不疑玄德”了。又如孙权赚杀关羽后，把首级转送曹操，以此嫁祸于魏；而曹魏不仅不受其骗，反而“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并葬之以大臣之礼”，来表示魏对蜀的好感，使刘备全力伐吴。孙权看到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于己时，又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表示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这是孙权转移矛盾、保存自己的策略。而曹操比孙权更狡猾，指出“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之上”。诸如此类斗争，在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财产的欲望，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不被消灭，总是玩弄各种手段，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活剧。

在《三国演义》里还可以看到，各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几个集团今天分，明天又合，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却又杯酒言欢。他们既争夺又勾结，而且这种斗争渗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等，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为斗争的工具。利用婚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三国演义》中就不乏其例。王允用貂蝉同时引诱吕布与董卓的所谓“连环计”，便是著名的例子。至于像孙权为夺回荆州，把自己的妹妹当作牺牲品，都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功利的目的。人们正是从这些人物形象和事件中清晰地看到，贪欲和权势欲如何主宰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三国演义》表现各个政治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运用种种手段，以达到消灭敌对势力的目的，但主要凭借武装力量，于是战争就构成了他们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小说中写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描绘的许多战略战术的运用，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

《三国演义》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的描绘具体表现出来的。小说写了近五百个人物,其中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等形象鲜明,脍炙人口。由于《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所以它把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罗贯中正是紧紧把握住曹、刘两个集团这条矛盾主线,从而刻画了政治、军事冲突中的群像。诸葛亮是作者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倾心赞颂和精心描绘的忠贞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曹操形象是一个既奸诈又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典型。而刘备则是一个与曹操奸诈性格相对立而出现的理想“仁君”形象。孙权用人精当,但缺乏政治远见,重视眼前利益,没有统一全国的雄图壮志,是一个守成者的形象。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的启迪以外,它更是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宏扬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罗贯中在战争描绘上表现了他的宏伟构想。这部小说写了一系列的战争,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虽然战争总是在紧张、惊险、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但并不显得凄凄惨惨,而是富于英雄史诗的高昂格调。另外,作者不仅善于错综交织地表现矛盾,而且善于在紧张斗争中,用抒情的笔调进行点染。如“赤壁之战”,在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不多,而摇曳多姿。其范例如诸葛亮草船借箭、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等“悠闲”插笔,这样山里套山,戏

中有戏，推波助澜，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整个赤壁之战的八回书，大起大落，波澜壮阔，而节奏又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凤管弦，光风霁月，如此布局，极见匠心。

《三国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卷。

作者刻画人物往往通过不同的矛盾冲突，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张飞怒鞭督邮一段痛快淋漓的描述，使张飞的疾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性格跃然纸上；“三顾茅庐”时，又显示了张飞口快心直、粗豪莽撞而又内心十分单纯的性格。

《三国演义》还善于通过渲染气氛和用对比、陪衬的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品质。如关羽斩华雄，并不具体描写交战过程，只写关外鼓声、喊声如地塌山崩，正当人们为关羽担心时，关羽已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出马前酬下的那杯热酒尚有余温。在这里，关羽的威风气势和勇猛善战的形象，传神地表现了出来，读之令人神往。

《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和精巧；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宾主照应、脉络分明、布局严谨，从而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至于小说的语言，正如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所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具有简捷、明快而又生动的特色。

《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可以说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三国演义》那样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根据《三国演义》一书故事情节改编的各种讲唱文学和各种戏剧蔚为大观，而且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也仍然继续流传在极其广大的地区。

《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瑰宝，随着世界文化的进

前 言

一步交流,《三国演义》也被多次译介到许多国家,其影响亦甚巨。

最后,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再做一简要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三国演义》的历次整理,都是采用毛宗岗本为底本。毛本是据明代版本加工修订的一个通行本,流传已久,文字上有好些优点,较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但毛本也存在不少问题,有明本原来不误的,毛本却改错了;有明本文字明显优胜的,毛本反改坏了。再者毛本初刊本已不易得,在它流行近三百年间,经过无数次的辗转翻刻、写印、排印,其中种种讹误,不一而足。因此,底本虽采用通行的毛本,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1954 年整理时,即注意到上述情况,于是乃参照明嘉靖壬午(1522)序刊本加以校订。若干毛本改错、改坏了的,皆斟酌情形,加以纠正。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就重排的机会,对全书再次作了核订。除据大魁堂藏版的毛本,校改了旧排本沿袭的误植外,又顺着历次整理的途径,作了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以便使其成为更利于阅读的一个通行本。

宁宗一

1994 年 10 月 16 日

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

《三国演义》最初由作家出版社整理，于一九五三年初版印行。我社于一九五四年以此为基础，重加整理，自一九五五年出版后，印行较久。这次是再度整理，改出新版。

历次整理，都是采用毛宗岗本为底本。毛本是据明代版本加工修订的一个通行本，流传已久，文字上有好些优点，较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但毛本也存在不少问题：有明本原来不误的，毛本却改错了；有明本文字明显优胜的，毛本反改坏了。再者毛本初刊本已不易得，在它流行近三百年间，经过无数次的辗转翻刻、写印、排印，其中种种讹误，不一而足。因此，底本虽采用通行的毛本，仍须进行必要的校订工作。

我社一九五四年整理时，注意到上述情况，就主要参照明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序刊本（过去曾称“弘治甲寅序刊本”）加以校订。若干毛本改错、改坏了的，斟酌情形，加以纠正。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泥信“古本”，只是希望整理过的毛本能成为错误较少、更利于阅读的一个通行本。

例如，第十九回写眭固“反投犬城去了”，毛本误“犬城”为“大城”（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证明本是）。

尤为突出的如，第三十八回叙孙权“广纳贤士”：“时有会稽阙

泽，字德润；彭城严畯，字曼才；沛县薛综，字敬文；汝阳程秉，字德枢；吴郡朱桓，字休穆；陆绩，字公纪；吴人张温，字惠恕；乌伤骆统，字公绪；乌程吾粲，字孔休……”云云。毛本误“严畯”为“严畯”、“汝阳”为“汝南”、“乌伤骆统，字公绪”为“会稽凌统，字公续”、“吾粲”为“吴粲”。其中骆统误为“凌统”一例，尤与文情不合，因为紧接着的下文就叙及“(孙)权部将凌操，……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统，时年方十五岁，奋力往夺父尸而归。”可见在此之先，凌统尚是追随父亲的一个不出名的少年，谈不上是招纳的所谓“贤士”之一；且凌统是吴郡余杭人，字公绩，毛本所载的籍贯、字号也都不确。

凡此一类，我们均依据明本，参酌史籍，加以改正。由于本书是普及性读物，避繁不作校字记，此类改动，不及备列，举例以概其馀。

毛本虽然是清初人所作的改订本，其中依然保存着一些元明时代（来源可能更早）的用语。如“无徒”是流氓无赖的意思，“磨旗”是圆圈式地挥舞旗帜的意思，过去通行的排印本臆改为“强徒”、“麾旗”等。我社在前次整理时亦就发现所及，作了纠正。

再有，《三国演义》毕竟不同于一般小说作品，它是历史小说，其中主要人物事迹绝大部分都是按照史籍记载的通俗演义。这样，书中存在的好些人名、地名、官制名称上的讹误，似乎就没有特别的理由要一任其继续沿误下去。校订中对这一类地方，凡是比較显著而不难考核的，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正。例如，第七回起写到“桓阶”，毛本、明本均作“桓楷”。此人《三国志·魏书》有传，其他史籍亦同作“阶”。似毋须拘执版本，保留“楷”这个误字，因即改为“阶”。至于回末联语中“求和桓阶又遭殃”句平仄遂难再调，只好任之。又如，第十六回“表赠陈珪秩中二千石”，毛本、明本均作“表赠陈珪致中二千石”，通行的排本又改“致中”为“治